

研究論文

# 講啥米話咁唔要緊？ 語言資本對族群間職業取得差異的影響

陳婉琪 溫郁文

陳婉琪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wchen@mail.ntpu.edu.tw](mailto:wchen@mail.ntpu.edu.tw)）。溫郁文 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chichyi@gmail.com](mailto:chichyi@gmail.com)）。本論文之起始為溫郁文之碩士論文，曾於2008年12月於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發表，感謝許嘉猷教授的評論。修改期間，感謝駱明慶教授與林明仁教授的意見，並感謝助理陳聰瑩、陳嵩明的參與討論。投稿過程中亦獲多位匿名審查人及編委會寶貴修改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09/3/5，接受刊登：2010/4/15。

## 中文摘要

既有文獻指出，國語作為一種官方語言，此語言能力可被視為一種語言資本，有利於職業地位的取得。但要證明語言資本的影響，由於適用資料不多，除了蔡淑鈴（2001）的論文之外，相關研究極少。除了國語能力在職業取得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外，本文企圖檢視其他語言能力是否也可被稱為語言資本，具有任何優勢？而不同的語言資本，在不同職業取得面向上各自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此外，由於傳統分析方式在因果關係上的推論限制，本文也將利用工具變項估計法，針對語言的影響力做更可靠的估計。「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涵蓋數種語言流利程度之豐富資訊，利用這份資料的獨特性，本分析得到以下幾項結論：一、國語能力對於脫離勞動階級、取得較高地位的職業確實有顯著正向影響；二、在相同教育程度下，外省族群職業地位較高，但國語能力解釋了大部分差異；三、控制教育及國語程度之後，客家族群具有顯著的職業地位弱勢；四、客家及外省人成為小雇主的機會比閩南人來得低，但閩南語能力是解釋閩南族群之小頭家優勢的主因；外省、客家人一旦掌握閩南語，脫離自營或受雇身分、成為小頭家的機會並無差異；五、一旦考慮到亟需人脈的「大雇主」身分，國語及閩南語都具有顯著正面影響；六、工具變項估計法得到的結果顯示，語言程度的實際影響力事實上要比傳統分析之估計值來得更大。

**關鍵詞：**語言資本、職業取得、族群、雇主、閩南語

**Does Language Matter?**  
**Ethnicity, Linguistic Capit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Taiwan**

Wan-chi C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Yu-wen Wen

M.A. in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Mandarin has been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aiwan since 1945. Mandarin fluency is regarded as linguistic capital leading to other forms of capital, and as a stepping-stone to gaining desirable goods and positions. Accordingly, the literature contains no studies of the role of Taiwanese dialect (*Minnangu*) in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even though it is the primary dialect for the majority Minnan ethnic population. Existing studies suffer from simultaneous causality, resulting in biased estimates of language effects. Here we use data from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to show that most differences between *Minnan* and non-*Minnan* Taiwanese are attributable to language rather than ethnicity. In addition to confirming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ation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our results underscore the role of a prevalent dialect in social mobility. Our specific conclusions are (a) Mandarin fluency is beneficial for obtaining higher-status jobs, and accounts for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advantage held by Mainlanders; (b) Minnan Taiwanese are more likely to own and operate small firms, with Taiwanese fluency explaining much of this difference with Mainlanders; (c) dual Mandarin/

Taiwanese fluency helps entrepreneurs develop medium and large firms; and (d)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nalysis provides a better estimate of true language effect on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Our results confirm existing findings that the actual language effect is larger than those generally described by conventional analytical strategies.

Keywords: linguistic capital,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ethnic group, entrepreneur

## 一、前言

資本主義社會中，大家都喜歡談「資本」（capital）。投資房地產、買股票、做個小生意，需要金錢資本，也正是「資本」最原初的定義。除了金錢資本之外，爲了提升個人的生產力，以確保職場上的競爭優勢，必須累積「人力資本」（Schultz 1963; Becker 1964）。爲了掌握人脈與關鍵資訊，則必須廣結善緣、交遊廣闊，這些人際網絡，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Lin 1999）。爲了和其他社會群體有所區隔（distinction），在社會中晉升或維持上層階級的地位，則需要「文化資本」的加持，否則就會落入「暴發戶」、「田僑仔」這類負面形象（Bourdieu 1977; Jæger 2009）。綜觀以上各式「資本」，共通性是什麼？簡單地說，它們（不論有形或無形）都是一種可欲資源，可以維持或提升擁有者的地位及資源優勢；而且各類資本，其形式經常能夠互相轉換。

以「文化資本」概念聞名的Bourdieu，也將語言視爲另一種形式的「資本」。Bourdieu（1991）認爲，語言並不單純只是彼此溝通的一種媒介，有些語言在經過國家或統治者認證後，即取得了合法正當性，成爲「官方正式語言」（official language）。而在「官方正式語言的建構、合法化，以及將之強制加諸於人民身上」的這個過程中，「教育體系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更精確地說，「學校教育體系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互動關係」<sup>1</sup>在「貶低方言，以及建立語言使用的新位階關係」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Bourdieu 1991: 48-49）。

台灣自四、五〇年代起，國民政府全面執行「單一國語政策」，

---

<sup>1</sup> 此辯證互動關係指的是學校與職場之間透過文憑而形成的緊密連結（由於勞動力市場上各種職位需要文憑作爲通行證）。

在基礎教育體系內及傳播領域中，特別加強官方語言的建構（洪惟仁 1995；王甫昌 1998）。<sup>2</sup>「講方言，罰一元」，這可說是五、六〇年代出生的世代（所謂的「四、五年級生」，或甚至包括「六年級前段班」）彼此共同的童年記憶。台灣人民所經歷的語言經驗，正為上述 Bourdieu 所描述的「官方正式語言之建構與合法化」之過程，提供了對照佐證的極佳實例。<sup>3</sup>

既然以「資本」標籤之，Bourdieu「語言資本」的概念亦包含了資本的特質：具備或精通合法正當性語言的能力，即是一種語言資本；它能夠轉化為其他形式的資本，透過轉化及累積的過程，讓擁有者保有或追求優勢地位及豐沛資源；再者，語言資本並非平均分配。這個因果關係的推論，帶有強烈的實證意涵——若能流利地使用一個國家的官方正式語言，即可幫助一個人取得經濟、社會或文化資本，取得較佳的社會位置。台灣既有實證研究的結論也大致支持此一理論的解釋力：國語能力在台灣並非只是人際溝通的媒介而已，同時「也是被統治者通往社經成就之路」（蔡淑鈴 2001）。

事實上，國外有另一系列的研究，將焦點放在語言能力對薪資所得、職業取得，及向上流動機會所帶來的影響。這批文獻將語言能力視為人力資本的一種形式，可以提高個人的工作效能與生產力，進而影響

---

<sup>2</sup> 國民政府於1945年推行「國語運動」，限制台灣本土語言的教育、使用、傳播，抑制方言使用。1956年教育廳即下令在校禁說台語，並組糾察隊，叫學生互相監視，說台語的學生被施以體罰、罰錢、或「掛狗牌」的侮辱。規定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只做「國語服務」。1976年行政院正式公布「廣播電視法」，其中規定「方言節目應逐年減少」（洪惟仁 1995: 124-126）。

<sup>3</sup> 其他領域，如人類學，亦有相關研究探究非官方語言被貶抑的過程（Gross 1993）。

薪資所得。由於對長期使用同一種語言的本國居民來說，語言能力的變異量不至於太大；因此，大部分研究都以新移民為研究對象，檢視移民之「語言能力」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而被檢視的「語言」，則是「被移民國」的「主要通行語言」，通常也是官方正式語言。這一系列文獻，在因果關係的推論上，與以Bourdieu理論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般說來，多數國家的主要通行語言與官方語言是一致的；因此，精通一種官方（共通）語言，即可同時滿足教育取得及進入勞動力市場兩種需求。然而，在台灣特殊的歷史社會脈絡中，官方語言與主要通行語言卻是不同的；作為官方正式語言的國語，在教育取得及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過程中，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作為多數族群母語的閩南語，雖在正式領域中曾被貶抑，但是在非正式領域中（如家庭、邊陲的勞動力市場），卻仍然是一個「主要通行語言」；在閩南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閩南語讓人覺得親切、有熟悉感，可快速接近彼此的距離（Sandel, Chao and Liang 2006）；另外，由於使用人口較多，閩南語相較其他族群母語，對國語也展現了較強的抗拒（葉錫南、詹惠珍、程玉秀 2004）。一般來說，對少數族群或移民群體而言，具備大社會之「主要通行語言」的能力乃當務之急，尤其是對需要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來說，這項需求並不難理解。因此，在台灣的特殊歷史脈絡之下，我們或許可以問：這兩種語言（國語／官方語言vs.閩南語／主要通行語言），會不會都是具有正向影響的語言資本？

「講台語，嘛欸通喔」這類的廣告語打得響亮，反應出閩南語在台灣的通行程度仍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不過，既有文獻的實證分析顯示，以量化的職業地位分數「平均」來看，主要使用閩南語的工作場域，是一個比較「壞」的勞動力市場（蔡淑鈴 2001）。然而，有些工

作，錢多事少離家近，平平穩穩過一生；有些職業，大風大浪波動頻，大起大落亦人生。除了地位高低之外，穩定度、風險、經濟收益、機會成本等，這些多重且複雜的面向，不也都是每個人重大人生選擇的關鍵考量因素？當我們在探討職業取得時，職業社經地位分數此一綜合指標似乎不足以完整地掌握這些複雜的考量。

一方面考慮到閩南語在台灣許多地區、工作場域仍占使用人數優勢的事實，另一方面考慮到上述職業的各種複雜面向，讓我們對既有文獻所提供的結論存有不少疑問。講啥米話咁唔要緊？習慣說哪一種語言，說得「輪轉」與否，有關係嗎？語言，對一個人的職業取得，或是在社會學家喜歡探究的「向上流動」過程中，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不同的語言資本，對不同的職業取得面向，是否展現不同的影響效果？

## 二、文獻探討

### （一）語言是一種資本

Bourdieu可說是深入發展「語言資本」（linguistic capital）此概念的第一人。他認為語言並不單純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具有合法正當性的語言，應被視為一種「資本」。一方面它能夠轉化為其他形式的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另一方面，它的取得並非平均分配，而是與經濟資源或政治權利十分類似地，由某些群體所壟斷（Bourdieu 1991）。換句話說，能夠流利地使用一個國家的官方正式語言（所謂的持有語言資本），可以幫助一個人取得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並取得較佳的社會位置。此處的因果關係推論便相當清



楚：使用不同的語言，尤指當一個人對於官方語言不具備基本流利程度時，會有實際的「社會經濟後果」。

雖然Bourdieu的論述隱含著明確的因果關係，不過直接引述他的語言資本概念，把焦點放在職業取得上，並以實證資料做檢證的研究並不算多。Smits and Gunduz-Hosgor（2003）的研究是其中之一。爲了評估在土耳其不會說土耳其語的「社會經濟後果」，作者比較了同屬少數族群，會說以及不會說土耳其語的兩群婦女，發現在其他條件（如年齡、居住地區都市化程度）相當的情況之下，不會說土耳其語的女性，進入正式經濟部門工作的機會顯著較低；此外，她們的丈夫之教育程度也較低，即使控制了學歷，職業也較差，整體家庭收入自然相對地較低。換句話說，會說土耳其語的女人在勞動市場及婚姻市場中，擁有較佳的競爭優勢。

除了上述以土耳其社會爲研究脈絡的分析之外，蔡淑鈴（2001）的論文，也是奠基於這個概念所延伸出來的實證研究，事實上也是關於語言資本這個主題最重要的台灣研究。暫留待下一節國內文獻一併探討。

社會科學當中另有一批文獻，也將焦點放在語言流利與否（language proficiency）所帶來的實質效應，且研究對象以移民或移民第二代爲主。這些研究者，將移民的語言能力（特指所處社會的主要通行語言）視爲一種人力資本，就跟一個人受教育、進而提升生產力的邏輯一樣，語言能力讓一個人藉由減少溝通成本，增進個人的生產力並提高賺取薪資的能力（Chiswick and Miller 1995, 2001）。有爲數不少的文獻，來自於不同國家的實證研究，都顯示移民之官方語言流利程度，對於移民的薪資所得具有顯著的影響（McManus, Gould and Welch 1983; Dustmann 1994; Shields and Price 2002）。Rooth and Ekberg（2006）則以瑞典的資料顯示，除了教育程度之外，移民的語言流利程度，也顯著

地影響其向上流動的機會。

以上「語言能力的好與壞，會顯著影響一個人的薪資所得」這項因果關係陳述雖然相當符合直覺，不過，也有不少人注意到，當我們以簡單迴歸方法來估計語言的效應時，有可能出現兩個問題，一是測量誤差，二是遺漏變項（omitted variable），兩者都會造成因內生性（endogeneity）所產生的估計偏誤問題（Chiswick and Miller 1995; Dustmann and van Soest 2001）。

更詳細地說，遺漏變項（譬如一個人未被測量出來的能力）可能造成語言程度與個人收入的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使我們高估了語言程度的影響力；事實上，同步因果關係（simultaneous causality）也可能是一個問題，會讓我們高估實際的語言效應；換句話說，一個人的語言能力可能會影響他／她的職業取得，但相反方向的因果關係也可能同時存在：進入某種職業狀態，可能讓一個人對於某種語言有較高的需求，使其有動機不斷精進其語言能力。相反地，測量誤差（指自我評估而得之語言程度）的問題則會造成語言效應的低估。在這些顧慮之下，研究者嘗試以不同的分析方法，或不同性質的資料來改善估計的問題，但仍然得到一致的發現，認為語言能力對收入的影響，甚至比傳統OLS迴歸估計出來的結果還要更大（Dustmann and van Soest 2002; Bleakley and Chin 2004）。<sup>4</sup>

以上文獻顯示，擁有所處社會主要語言之能力，就是一種人力資本，而這項優勢確實能夠轉換成其他形式的資本。換句話說，上述文獻雖未引用Bourdieu的語言資本概念，但不論在概念層面，或是在因果關

---

<sup>4</sup> Dustmann and van Soest（2002）以長達十年的長期追蹤調查資料來解決遺漏變項的問題；Bleakley and Chin（2004）則以幼年移民的年紀，當作工具變項（instrumental variable），同時解決遺漏變項與測量誤差的問題。

係的證明層面，這兩個系列的文獻累積事實上具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除了談論語言資本所帶來的影響之外，也有一些研究者探討第一代移民與第二代移民之間語言能力的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正如經濟資本、文化資本（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經常能夠從上一代傳遞至下一代一樣，實證研究指出父母親在家講何種語言，對下一代語言學習之重要性（Chiswick, Lee and Miller 2005），並證實語言能力的代間傳承（Bleakley and Chin 2008）。不過，在正式官方語言和主要通行語言有所不同的情況之下，這批文獻卻無法幫助我們回答：非官方語言，在使用人數眾多的情況之下，是否也具有任何正向功能？

## （二）台灣文獻

### 1. 族群間職業取得之差異

在進入語言與職業取得此主題之前，先來看看台灣本土文獻中，關於族群間職業取得及行業分布之差異。

單就平均職業地位而言，本省、外省族群之間存有一段差距（蔡淑鈴 1988）。不過在職業地位差異之外，較常被討論的是外省與其他族群之間的職業區隔現象。稍早的調查資料分析顯示，外省族群比台灣本地族群更傾向集中在政府部門，從事軍公教的職業（林忠正、林鶴玲 1993；吳乃德 1997；蔡淑鈴 2001）；閩、客族群較集中於初級產業與製造業，外省族群較集中於服務業；中小企業中，本省族群較多，但大型集團企業領導階層中，外省族群則占相當比例（林忠正、林鶴玲 1993）。在從業身分的族群比較方面，蘇國賢、喻維欣（2007）分析1980年的戶口普查資料，發現「雇主」的比例並沒有族群的差別，但

「自雇」此類別則以本省族群的比例較高；<sup>5</sup> 此外，透過檢驗各職業類別的省籍比例，他們發現，外省族群選擇和語言文字能力有關的職業<sup>6</sup>之機率偏高。

在解釋職業地位的族群差異上，教育程度占關鍵角色。而比較各族群之間的教育程度，平均來說又以外省族群顯著高出許多（駱明慶 2001, 2002；陳婉琪 2005）；換言之，教育程度是一項解釋差異的關鍵因素（蔡淑鈴 1988；吳乃德 1997；Wang 2001）。然而，除了教育程度之外，還有哪些因素造成族群之間的職業地位差異或職業區隔現象？職業除了地位的高低、領域的差異之外，還有許多相當複雜的不同面向可探討；但在篇幅及資料的雙重限制之下，此處暫將文獻探討的焦點鎖定在其中一個面向——「雇主」這個從業身分。使用在地語言來說，也就是，誰是老闆（「頭家」）呢？（在此老闆、頭家皆指雇主身分）<sup>7</sup>

關於族群或省籍因素與雇主此從業身分之間的相關，文獻上討論的似乎並不多。蘇國賢、喻維欣（2007）採用戶口普查的資料顯示，雇主比例並沒有明顯的族群差異；但是這份分析無法區分不同企業規模的雇主。除了族群因素之外，在另一份研究中，兩位作者則以實證分析指出，先前的自營經驗，顯著地影響一個人創業成為雇主的可能性

---

<sup>5</sup> 這項從業身分比例之族群比較，排除了務農人口及在公部門任職者；此外，因資料限制，「雇主」身分無法區分企業組織的大小。

<sup>6</sup> 例如：編輯、記者等傳播媒體相關行業，以及作家、評論、翻譯等與文字高度相關的職業。

<sup>7</sup> 國語中的「老闆」或閩南語中的「頭家」這些詞語，在未清楚定義的情況下，經常混淆著「雇主」（指僱用員工之民營事業主或事業經營之負責人）與「自營」（指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之民營事業主或負責人）這兩種從業身分之可能性。因語言上有此混淆，必須事先做一些澄清。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要將焦點放在「雇主」身分，而不考慮「自營業者」。

(Yu and Su 2004)。熊瑞梅、黃毅志(1992)則指出，社會網絡資源與小資本階級兩者之間有顯著相關；相較於受雇階級，小資本階級擁有較佳的網絡資源，<sup>8</sup> 經濟報酬也較佳。關於小頭家的經濟優勢，黃毅志(2001)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論。

相較於「雇主」此從業身分，族群差異反而在「自營」這個從業身分上有較明確的結論；閩、客的自營比例向來比外省族群來得高(林忠正、林鶴玲 1993；Wang 2001；蘇國賢、喻維欣 2007)。但是，我們如何解釋省籍與自雇身分之間的相關？哪些因素會影響一個人進入「自營」此從業身分？

黃毅志(2001)比較不同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發現不論是職業聲望或是收入，都以公部門為最高。喻維欣、蘇國賢主張，平均來說工作條件較差的私部門，是台灣整體來說自營比例比其他國家還要高的主因(Yu and Su 2004)。他們的實證研究也顯示，當一個人的工作條件較差(如沒有工作保障、所在企業組織沒有工會等)，他/她進入自營此從業身分的機會就顯著增加。經濟學者的研究也顯示類似的結果，景氣惡化時，私人受雇者轉換為自營作業工作的機率提高(于若蓉 2004)。除了就業條件之外，是否具有人際網絡、社會資本(亦即足夠的人脈)，也被指出是影響進入自營從業身分的重要因素(Yu and Su 2004)。

綜合歸納以上的文獻探討，本省族群的平均教育程度較低，相較於外省族群，進入公部門的機會較低；而台灣的私部門生產組織又以工作保障較低、福利與環境較差的中小企業為主，如果說缺乏保障、條件不佳、在不景氣時期更容易受到影響的受雇環境，是驅使私部門受雇者進

---

<sup>8</sup> 這兩者之間有可能是同步因果關係：較佳的社會資本增加晉升小資本階級的機會；成為小資本階級也可能進一步累積社會資本。

入自營狀態的主因之一，那麼，本省族群在自營狀態的比例偏高，也就得到十分合理的解釋。此外，如果自營身分確實如既有實證分析所顯示，會提高晉身雇主的機會，那麼「雇主身分沒有族群差異」這項結論似乎令人懷疑，值得重新檢驗。

## 2. 用語言資本來解釋職業取得的族群差異

除了上述平均教育程度的差距以及經濟機會的結構因素之外，其他還有什麼樣的影響因素或機制，可以解釋外省／本省族群的職業差異？相關主題另有兩份重要的研究，兩者同樣探討外省與本省族群之間的職業（地位或類別）差異，也同樣認為語言資本、文化上的親近性等因素，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不過，針對外省族群國語優勢的後果，這兩份研究卻提供了不同的詮釋。

首先是蔡淑鈴（2001）關於職業階層化的研究。她將Bourdieu的語言資本概念做實證的延展，利用1992及1999年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根據分析結果做出以下的詮釋：（1）國語能力是一種正向的語言資本，有利於職業地位的取得。國語越流利的人職業地位就越高，即便在控制了教育程度與家庭背景的情況之下也是如此；但閩南語則無任何效應。因此，國語流利，是「閩南人向上流動必備的另一項基本條件」。

（2）語言使用的本身，就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展現。使用不同語言的工作在職業地位上有清楚的位階；閩南語的工作領域是一個「壞」的勞動市場，而使用國語的工作領域則是一個「好」的勞動市場。作者並透過檢驗工作的語言需求及其職業地位兩者之間的相關，來呈現這種位階關係。

不過，上述研究結論乃立基於橫斷面資料及傳統迴歸分析方法，蔡淑鈴所做出的詮釋（亦即「國語流利程度對一個人的職業地位高低

會有正向的影響」），嚴格來說，其意義應是「在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條件相當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國語流利程度與職業地位分數是成正相關的」。相關未必等同於因果關係。換句話說，此正相關很可能是虛假相關（譬如，一個人學習能力強，進而同時影響其語言程度及職業地位），語言與職業之間也可能具有同步因果關係（進入地位分數較高的職業領域，反過來也影響著他／她的國語程度）。因此，我們並無法完全確定傳統方法所估計出來的語言效應，究竟是否，或當中有多少成分，是真正能夠影響職業取得的語言效應。如前一節所簡述，近十年來一系列的國外文獻摒棄傳統分析方法，改而採用追蹤調查資料或工具變項估計法來尋求更為可靠的答案。而蔡淑鈴這份研究的推論限制，事實上正是國外學者倡議改善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蘇國賢、喻維欣（2007）分析戶口普查資料，發現在同性別的大學教育程度人口當中，外省族群就讀文科的比例，始終比本省族群高。作者提出幾個可能的原因，包括：考試科目的加權計分造成的誘因（文組考生在「國文」一科加重計分）、家長職業對子女的直接影響（外省籍家長較常從事「文」職），以及家庭社經背景對實用知識偏好的影響等。與就讀科系相對應地，外省族群也有較大的機率從事和語言相關的職業。兩位作者並認為，語言能力相對優勢、職業文化上的親近性，以及職業類聚等因素很可能是群體差異背後的影響機制，而這種職業上的差異性人口分布，成為本省與外省族群社經地位差異縮減、迅速平等化的重要結構性因素。

對比這兩份研究，我們發現，蔡淑鈴將焦點放在國語作為一種語言資本的正面影響，但蘇和喻兩人則認為，正是因為具有語言上的優勢、文化上的親近性，使得外省族群在教育及就業上，傾向選擇和語言有關的科系與職業；然而，在科系選擇上，文科畢業生在經濟上的前景不若



理工科或商科，職業選擇的傾向（語文相關職業或公部門）又讓他們較難累積「創租資本」，且不易透過代間移轉來繼承優勢。換句話說，外省族群原先具有的語言文化資本優勢，得失難以論定；長期來看，這些傾向與選擇（也可說是為了使自己得到多一點教育優勢的理性選擇），隨著其他族群在教育機會上之迎頭趕上，伴隨而來一些非預期的負面影響；從階層化的長期角度來看，優勢漸減，甚至可能反成弱勢。兩份研究，就如銅板的兩面，提供了不同面向卻又相輔相成的研究觀點。

### （三）文獻小結與提問

綜合以上國內外文獻探討，我們可以得到幾項暫時的結論：

一、不論是平均職業地位或是職業類別分布，確實存在著一些族群差異。就省籍因素來說，外省族群較為集中於公部門，本省族群的自營比例較高，外省族群進入和語文有關的職業之機會較大。而平均教育程度的差距，是最常被用來解釋平均職業地位之省籍差異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經濟機會的結構因素，則可用來解釋本省族群自營比例較高的現象。不過，在考慮平均教育程度差距之後，真正針對職業取得來檢視族群差異的文獻並不多。

二、國內外文獻一致顯示，官方語言的流利程度對於一個人所得、職業取得，有著獨立於其他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的影響力。不過，在台灣，有的觀點將國語能力視為一種具有正向影響的語言資本，有利於職業地位之取得；另一種觀點則基於族群及語言文化之間的親近性，而主張外省族群即便曾受惠於「語言文化的親近性」，其優勢也因社會競爭下每個理性行為者的合理選擇而逐漸消失，甚至反成弱勢；換言之，語言文化優勢形塑了行動者的選擇傾向，並可能帶來機會結構上的



限制。

三、關於語言效應的評估，國外已有不少文獻反省了傳統分析方法的限制，並應用更好的資料及分析方法來重新評估語言程度的影響。不過台灣既有文獻在這方面尚無相關的嘗試。

基於上述既有文獻的累積，本文將鎖定三項研究焦點：一是職業取得的族群差異，二是語言資本所扮演的角色，三是應用工具變項來對語言效應做更準確的估計，並將之與傳統估計方法做比較；以下並依此順序提出本文的五個研究假設。

針對第一項研究焦點——職業取得的族群差異，本文將鎖定職業地位高低以及雇主身分兩個面向。首先，國語為台灣的正式官方語言，基於國外實證研究所顯示的（官方正式）語言能力之重要性，以及國內學者蔡淑鈴（2001）所指出的「國語能力之於職業地位具有獨立於教育程度之外的影響力」，我們可以得到以下推論：

(i) 在族群之間的平均國語能力確實有差異的情況下，對教育程度相同者來說，取得高（或中）職業地位之百分比，可能仍存在著族群差異。

接著，就「雇主」身分這個面向來說，從以上文獻探討中，我們綜合了三項因果關係的推論：一、受雇於條件較差的私部門，增加一個人進入自營業的機會；二、較豐沛的人際網絡、社會資本，提高一個人進入自營業的機會；三、「自營」此從業身分，提高升級為「雇主」的機會；那麼，在「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工具，以及展現文化上的親近性，因此具有轉化為社會資本的效果」此前提下，閩南族群同時滿足「較高的比例受雇於平均來說條件較差的私部門」及「語言因素可能帶來較多的

人脈」這兩個條件，提高了自營的機會，又間接地提高了升級成爲「小頭家」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推論：

(ii) 相較於客家及外省族群，閩南族群有較大的機會成爲小雇主。

檢視職業的族群差異之後，我們要進入第二項研究焦點——語言資本的影響力。語言的使用及流利程度，在職業取得的不同面向上，有多少影響力？在職業的族群差異上是否扮演任何角色？在台灣，只有國語才算語言資本，對職業取得具有正面影響嗎？

多數探討語言資本的國外文獻，大多以身爲少數族群的移民爲對象，其社會脈絡與台灣不盡相同。台灣由於歷史及社會特殊之處，導致作爲官方語言的北京話並非本省多數族群所熟悉的語言；雖然，在本省族群當中，閩南族群因人數占大多數，相較之下在語言的存續及通行上享有較多的優勢（洪惟仁 1995），但是，蔡淑鈴（2001）的研究也顯示，使用國語的工作領域，是比較「好」的勞動市場，也就是說工作場所中經常使用台語是較「差」的勞動市場。因此，在針對國語能力的分析之外，本文也將探究，閩南語在職業取得的過程中是否扮演任何角色？在什麼樣的環境脈絡下才能發揮作用？

首先，針對「職業地位」，如果語言資本也是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具有獨立於教育程度之外的正面影響，那麼，我們可以推論：

(iii) 國語作爲台灣的官方正式語言，國語能力會對職業地位的取得有顯著影響，且這項影響獨立於教育程度及族群身分。而此語言效應是解釋職業地位之族群差異的中介因素。

接著，我們要將焦點放在平均經濟報酬較佳的「雇主身分」上。如果較豐沛的人際網絡、社會資本，提高一個人進入自營業的機會，而自營身分又會提高升級為「小頭家」的機會，那麼，在「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工具，並可展現文化親近性，因此具有轉化為社會資本的效果」此前提下，我們可以推論：

(iv) 作為台灣的主要通行語言之一，閩南語能力對於成為小雇主具有正影響；這項推論，對非閩南族群也成立。而且，這項語言效應有可能是解釋族群差異（指「假設（ii）：閩南族群有較大的機會成為小雇主」）的中介因素。

最後，針對第三項研究焦點——語言效應的重新估計，如同較新的國外文獻所指出，傳統分析方法在估計語言程度真正的影響力時，具有相當大的限制。「遺漏變項」以及「同步因果關係」會讓研究者高估了語言程度真正的影響力，相反地，語言能力的「測量誤差」則可能導致語言效應的低估；這些問題都使得推論有相當大的限制，甚至產生不可靠的研究結果。綜合了高估與低估這兩種偏誤的可能性，語言能力的影響程度究竟是有或無、大或小，成為一個實證上的問題。因此，本文在後半段將應用「工具變項」來對語言效應做更準確的估計，並將結果與傳統估計方法做比較。參考國外實證研究的結果，我們預測：

(v) 語言程度的實際影響力，有可能比傳統估計方法所估計的還要更大。

### 三、資料與方法

#### (一) 資料來源與變項說明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來自於「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或TEPS)。這是一項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和國科會共同資助,並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和歐美研究所共同負責規畫與執行的一項全國性長期追蹤調查的資料庫計畫。這項計畫從2001年開始,針對當年為國中一年級以及高中、高職和五專二年級之學生,並將調查對象延伸至學生家長、老師、和學校,以問卷自填的方式,進行二至四次的資料蒐集。在抽樣設計方面,TEPS依照台灣地區(含澎湖離島地區)的城鄉分布、公立與私立學校的差異、及國中、高中/高職、五專等學制作為分層的依據,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抽樣,具有兼顧台灣地區城鄉分布的特點,讓所抽取的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

本分析選擇第三波家長問卷的調查結果,並將分析範圍限於男性家長的樣本,並且排除原住民樣本(N=9,357)。<sup>9</sup>雖然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於過去數十年間迅速增加,但在傳統價值觀仍具相當影響力的台灣社會當中,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比例仍較男性為低,其職業地位的變異量也較小。因此針對職業取得此主題,仍優先選取男性樣本。女性的勞動參與與職業取得,也十分值得探究,但因篇幅限制,可能需另闢獨立論文。

---

<sup>9</sup> 一稿中的分析包含了原住民;相較其他三大族群,原住民樣本只有130人(1.4%);分析中納入原住民樣本與否,並不影響其他主要結論,但因原住民人數過少,為避免參數估計不穩定,本分析最後捨棄原住民樣本。

採用TEPS資料的家長樣本來作分析，缺點相當明顯。因為它並非以所有成年人口為母群體而得來的隨機樣本，等於是排除了無子女人口，在分析結果的推論上會有所限制。不過，對照同時期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本分析採用資料之調查年為2005-06年），針對同世代男性，比較其族群分布，與本分析所採用的資料不至於有太大的差異，<sup>10</sup> 雇主身分的百分比分布也相當接近，<sup>11</sup> 增加了適度推論的可能性。不過，仍需注意的是，比較樣本及母群體的教育程度分布之後，我們發現本文分析樣本在「國中及以下」此類別的比例是偏低的，「高中職」則比例偏高。<sup>12</sup> 與教育程度高度相關的職業變項，也反應類似的情形：「低職業地位」的比率可能偏低。<sup>13</sup> 這很可能是由於教育程度國中以下者的未婚率在各層級教育程度當中是最高的。<sup>14</sup> 因此，本文分析結果若要做推論，至多只能限於已婚有子女人口。

在有如此缺點限制的情況下，為何使用這個資料庫？最主要的理由

---

<sup>10</sup> 社會變遷同時期（2005-6）的調查資料中，出生於1950-65年之間的男性樣本，閩、客、外、原等四族群之百分比分別為70.0%、15.9%、13.0%及1.4%，本分析資料之分布則為75.0%、12.3%、11.3%及1.4%。

<sup>11</sup> 社會變遷同時期調查資料顯示，出生於1950-65年之間的男性樣本（限閩、客、外三族群）當中，大雇主（雇員至少十人）、小雇主（雇員不超過九人）比率分別為4.0%、11.1%，與本文資料相當接近（3.9%、10.7%）。

<sup>12</sup> 本文分析資料各級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及以上）之百分比分別為31.0%、39.5%、16.5%及13.0%，而台閩地區人口統計資料（2006）顯示，同世代男性的教育程度分布則為35.4%、34.6%、14.5%及15.5%。

<sup>13</sup> 社會變遷同時期調查資料顯示，高、中、低職業地位三群體之比率分別為15.8%、41.0%、43.2%，而本文分析資料之相應數據則為16.3%、46.9%、36.8%。

<sup>14</sup> 最近三十年來的人力資源調查顯示，40-44歲的男性當中，學歷較低者（國中以下）始終是未婚比例是最高的一群，近年更為明顯（駱明慶 2006：表4）。

自然是它涵蓋了與語言資本相關的豐富資訊。但除此之外，針對目前的分析主題，這份資料仍具有其他資料難以取代的優點：

1. 將近一萬人的樣本數，在區分族群與教育程度之後，各次群體仍有相當足夠的人數讓我們能夠觀察職業地位的分布（參見表1）。

2. 這些樣本幾乎都集中在同一個世代。絕大多數的樣本（94%）出生於1950至65年之間，超過八成集中在1955至65年之間，<sup>15</sup> 也就是台灣新流行語當中俗稱的「四年級後段班」以及「五年級前段班」。對比之下，以所有成年人口為母群體而得來的其他資料庫樣本，反而常因世代（年齡）分布太廣而使得潛在的（與時間點有關的）干擾因素增加，當我們嘗試以切割世代的方式來做細部檢驗時，則又經常面臨分組之後樣本數過少、分析困難的問題。

在利弊權衡之後，我們認為針對前述研究提問，TEPS可以讓我們針對同一個世代，深入瞭解族群之間職業取得的差異，以及語言資本是否扮演任何角色，算是相當適合且品質甚佳的資料來源。

本文的分析焦點在於（男性家長樣本的）職業，採用了兩種被解釋變項，來自兩個問項——職業以及從業身分。

第一個被解釋變項，是將職業地位分為三類；為求簡潔，在表格中姑且以高、中、低簡稱之（參見表1）。將職業地位做這樣的區分未免顯得過於專斷；不過，這項分類的主要原則，是將需要高人力資本的專業以及管理階層歸為第一類，包括了高層專業人員（如醫師、律師）、行政主管、企業主管、經理人員及民意代表；第二類較為龐雜，不屬於第一類也不屬於第三類者，包括（中小學、特教、幼稚園）教師、一般專業人員（如一般工程師）、技術員及半專業人員（如代書）、事務工

---

<sup>15</sup> 出生年介於1922-49年者占2.8%、1950-54年占13.2%、1955-59年占40.0%、1960-65年占40.7%、1966-80年占3.3%。

作人員、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第三類則屬低技術、勞力密集的職業，包括農林魚牧工作人員、技術工、操作工及裝配工（如司機）、非技術工（如工友、體力工）。

第二個被解釋變項為「是否當老闆」（三類別：自己當老闆且雇用含九位以下領薪水的員工、自己當老闆並雇用十位以上領薪水的員工、非雇主身分）。這項資訊來自於問項「您為誰工作？」，亦即調查受訪者的從業身分。

將被視為分析焦點的解釋變項包括：族群（閩南、客家、外省），以及語言能力（包括受訪者自我評估而得的國語流利程度及閩南語流利程度）。所有語言流利程度都區分為五等級：不會、會一點、可以溝通不算標準、還算標準、標準。教育程度（國中或以下、高職、高中、專科、大學、研究所）與年齡（將出生世代分成五組控制）（參見註腳15），則基本上被視為控制變項。

## （二）分析方法

第四節分析結果的第一部份，以交叉表格呈現職業地位及雇主身分之族群差異。第二部分將以多項式邏輯迴歸，針對「職業地位」及「雇主身分」來評估語言效應。相較於第三部分的工具變項估計法，第二部分乃所謂的（估計可能會因各種內生性問題而產生偏誤的）傳統估計方法。在這個部分，表格所呈現之數值，都是將多項式邏輯迴歸之係數做指數轉換，成為「勝算比」（Odds Ratio）。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相較於原始係數，勝算比的意義能夠直接被詮釋，易於理解；解釋變項對被解釋變項所產生的影響方向是正（ $>1$ ）或負（ $<1$ ），也很容易判斷。

分析的第三部分，我們將應用「工具變項」（instrumental



variable) 來重新估計語言能力的實際影響。如同國外相關文獻所指出，以傳統分析方式來估計語言效應時，遺漏變項會使我們高估了語言程度的影響力，而測量誤差（指自我評估而得之語言程度）會造成語言效應的低估；此外，即便語言能力會影響職業取得，一個人的職業，也很可能持續影響著他／她的語言程度；譬如，當一個人每天在工作上需要接觸某種類型的客戶，他／她可能比其他人有更多練習某種語言的機會。換言之，語言與職業之間具有同步因果關係（simultaneous causality），這也會造成語言效應的估計偏誤。而「工具變項分析法」，正是目前用來解決以上各種內生問題（尤其是最難解決的同步因果關係）的一種適當的分析策略，讓我們可以得到沒有偏誤的效應估計值（Winship and Morgan 1999）。

工具變項估計法可應用於OLS迴歸或（適用於二元依變項的）probit模型。應用此估計法，最大的挑戰在於是否能夠找到適當的「工具變項」。判斷所選取的工具變項是否適當，端視它是否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該工具變項對我們原先所關心的解釋變項（亦即「具有內生性的解釋變項」）是否有「十分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兩者之間是否具有足夠強度的相關（Stock, Wright and Yogo 2002）？二是該工具變項是否對被解釋變項不具直接影響，換句話說，該工具變項若對被解釋變項產生影響，是否只能透過「具有內生性的解釋變項」？這兩項要件即文獻上所謂的工具變項的相關性（instrument relevance）與外生性（exogeneity）。

以本文的第三部分分析為例，我們將採用「岳父族群」以及「妻子語言」當作工具變項。針對第一個條件「工具變項的相關性」，以「岳父族群」為例，F檢定可以讓我們確定：（i）當岳父族群為外省時，會對該受訪者的國語流利程度有顯著的正影響；（ii）當岳父族群



為閩南時，會對該受訪者的閩南語流利程度有顯著的正影響。而第二項條件「工具變項的外生性」所指的意涵是：（i）岳父族群不會「直接地」影響到該受訪者的職業取得，只會「間接地」透過影響其語言能力，來影響他的職業取得；（ii）妻子的語言程度不會「直接地」影響到該受訪者的職業取得，只會透過影響其語言能力這個管道，來「間接地」影響他的職業取得。這項「外生性」條件，雖然在統計上要完全確定此前提之成立是不可能的，經常必須倚賴常識性的判斷，但是，當工具變項個數大於內生解釋變項的個數時，「過度認定測試」（overidentification test）可以幫助我們確認工具變項是否符合外生性假設（Sagan 1958）。<sup>16</sup> 此外，同時控制其他相關變項（如教育程度）亦有助於確認這項條件。

工具變項估計法分為兩個階段。先選取一（或數）個變項作為「工具」（instruments），在第一階段中，先以這些工具變項，加上其他控制變項，針對具有內生性的解釋變項（在本文中為國語或閩南語流利程度）來做迴歸或probit分析。接著在第二階段，再將第一階段分析所得到的預測值，代替原先那個具有內生性的解釋變項的實際觀察值，並加上其他控制變項，針對被解釋變項（在本文中為「職業地位高低」或「雇主身分」）來做迴歸分析。以國語能力為例，此時，原解釋變項（受訪者的國語程度）具有內生性、會使傳統分析產生估計偏誤的那一部分，已經被留在殘差裡，而我們在第二階段只使用新的預測值來分析。更淺白地說，當一個人的國語程度，受到職業影響的那一部分，我們已將之排除在外，只考慮「受到岳父省籍影響的那一部分」國語能力，但因為岳父族群不會影響到受訪者的職業地位高低，因此，檢視這部分的國語能力是否對職業取得有影響時，應當得到沒有偏誤的語言效

---

<sup>16</sup> 關於過度認定測試，第四小節分析結果部分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表1 比較各族群職業地位（三分類）之百分比<sup>a</sup>

	職業 <sup>b</sup> 地位 (%)	族群 (男性)		
		閩南	客家	外省
總計	高	14.9	14.6	28.4
	中	46.5	46.7	53.1
	低	38.6	38.7	18.5
	總計 (N)	100% (7,154)	100% (1,172)	100% (1,031)
$\chi^2$ (df) = 212.33 (4) ; p = 0.00; Cramer's V = 0.11				
(區分教育程度)				
大學 (及以上)	高	46.6	43.7	51.2
	中	50.2	54.3	44.8
	低	3.2	2.0	4.0
	總計 (N)	100% (968)	100% (151)	100% (328)
$\chi^2$ (df) = 5.10 (4) ; p = 0.28; Cramer's V = 0.04				
專科	高	24.3	25.5	30.8
	中	61.7	61.1	59.3
	低	14.0	13.4	9.9
	總計 (N)	100% (1,268)	100% (216)	100% (263)
$\chi^2$ (df) = 6.77 (4) ; p = 0.15; Cramer's V = 0.04				
高中職	高	8.9	8.4	11.4
	中	51.8	46.5	60.6
	低	39.3	45.1	28.0
	總計 (N)	100% (2,843)	100% (557)	100% (361)
$\chi^2$ (df) = 27.46 (4) ; p = 0.00; Cramer's V = 0.06				
國中 (及以下)	高	2.7	1.2	3.8
	中	28.3	29.8	31.6
	低	69.0	69.0	64.6
	總計 (N)	100% (2,075)	100% (248)	100% (79)
$\chi^2$ (df) = 2.99 (4) ; p = 0.56; Cramer's V = 0.02				

<sup>a</sup> 資料來源：TEPS第三波調查資料男性家長樣本（九成以上樣本出生於1950-65年之間），但不包括原住民及其他（各族群比例分配與社會變遷合併資料庫的同世代樣本極為相似）。

<sup>b</sup> 職業地位分類：高 = 高層專業人員（如醫師、律師）、行政主管、企業主管、經理人員及民意代表；中 =（中小學、特教、幼稚園）教師、一般專業人員（如一般工程師）、技術員及半專業人員（如代書）、事務工作人員、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如廚師）；低 = 農林畜牧工作人員、技術工、操作工及裝配工（如司機）、非技術工（如工友、體力工）。

應估計值。

## 四、分析結果

### (一) 職業地位與雇主身分之族群差異

職業取得的族群差異，是本文的第一項研究焦點。表1以簡單的交叉表格呈現了各族群之間職業地位（高中低三類）的百分比差異。整體來看，閩、客兩族群之間，職業各分類的百分比幾乎沒有太大的差距；相較之下，將近三成的外省族群取得高層專業或管理階級的職業，比例明顯偏高（28.4%），幾乎達閩、客族群（14-15%）的兩倍。區分了教育程度之後，這項差距不再那麼明顯；然而在相同教育程度之下，外省族群取得高職業地位的比例仍偏高，進入低職業地位的比例則偏低（四個數值當中只有一個例外）。至於此差異在統計上是否顯著，留待表3以模型來檢驗。在此，簡單的描述統計結果符合了假設（i）的推論。

表2則呈現了雇主比例之族群差異。第一列為大雇主所占百分比（擁有至少十位雇員的雇主，應屬中型或大型企業老闆，在此簡稱大雇主），閩南與外省族群之間沒有太大差異（每百人約有四位為大雇主身

表2 比較各族群雇主身分之百分比

雇主身分 (%)	總計	族群 (男性)		
		閩南	客家	外省
大雇主 (雇員 ≥ 10人)	3.9	4.1	2.6	4.2
小雇主 (雇員 ≤ 9人)	10.7	11.3	8.8	9.0
非雇主身分	85.4	84.6	88.6	86.8
總計	100%	100%	100%	100%
(N)	(9,634)	(7,326)	(1,204)	(1,104)

$\chi^2$  (df) = 17.98 (4); p = 0.001; Cramer's V = 0.03

分），但客家族群的大雇主比例則偏低。檢視第二列，我們發現閩南人確實有偏高的比例屬雇員不超過九人的「小頭家」身分。研究假設（ii）得到支持。

## （二）語言資本所扮演的角色

### 1. 職業地位高低

針對語言能力對職業地位取得之影響，表3呈現了多項式邏輯迴歸的分析結果。模型二的結果，與先前表1所呈現的結果事實上是相同的，亦即：在相同的教育程度之下，外省族群取得高層專業、管理階級此類職業的機會顯著來得高，勝算（Odds）為閩南族群的1.69倍，取得中職業地位的勝算，也比閩南族群多了41%。

模型三與模型四（表3），先後將國語及閩南語流利程度納入分析，使得先前的族群差異（不論是優勢或是無差異）發生了十分有趣的變化。首先，對外省族群來說，納入國語能力之後，先前的外省優勢大幅降低；對中職業地位之取得而言，與閩南相較之下已經不再有顯著差異；對高職業地位此類別而言，在控制語言程度之後，外省（相較於閩南）族群雖仍有顯著較高的勝算，但勝算比已從1.69降至1.38（模型四），顯示國語能力解釋了部分的外省職業取得優勢。至於剩餘未被解釋的部分，外省族群平均來說較佳的英語能力有可能扮演某種程度的角色（分析結果未顯示）。<sup>17</sup>

---

<sup>17</sup> 一稿中的分析曾將英語能力納入分析。在相同教育程度下，外省族群的英語能力顯著較其他族群更佳；而在國語、閩南語之外，進一步納入英語能力的分析結果顯示，閩南及外省之間取得高職業地位的差異不再顯著。但為避免探討焦點過多，失於龐雜，且限於篇幅限制，針對英語能力的分析暫時割捨。

表3 族群及語言能力對職業取得之影響：多元邏輯迴歸分析<sup>a</sup>

(N=9,368)

解釋變項 <sup>b</sup>	依變項：職業地位（三分類）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職業（中）= 一般專業、半專業、服務業（相較於農工階級）				
族群（相對於閩南）				
客家	1.00 (-0.02)	0.89 (-1.62)	0.77*** (-3.45)	0.76*** (-3.45)
外省	2.37*** (9.83)	1.41*** (3.56)	1.20 (1.89)	1.18 (1.68)
教育程度		2.13*** (33.51)	2.01*** (30.29)	2.01*** (30.06)
國語流利程度			1.41*** (9.97)	1.42*** (9.48)
閩南語流利程度				0.98 (-0.52)
職業（高）= 高層專業、經理、主管（相較於農工階級）				
族群（相對於閩南）				
客家	0.97 (-0.29)	0.86 (-1.32)	0.68*** (-3.46)	0.72** (-2.79)
外省	3.96*** (13.80)	1.69*** (4.48)	1.29* (2.14)	1.38** (2.58)
教育程度		3.71*** (43.22)	3.39*** (39.20)	3.40*** (39.11)
國語流利程度			2.06*** (12.11)	1.98*** (10.83)
閩南語流利程度				1.09 (1.48)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215.7 (4)	3176.8 (14)	3360.2 (16)	3365.0 (18)
Pseudo R <sup>2</sup>	0.011	0.167	0.176	0.176

<sup>a</sup> 本分析只限男性樣本，且不包括原住民；表中數字為多元邏輯迴歸所得之勝算比（=exp(β)）；括號內數據為z值。

<sup>b</sup> 教育程度分別以連續變項（六等級）或虛擬變項來控制，都得到十分相似的結果，故此處以較簡潔的形式來呈現結果；各項語言流利程度皆為五等級；其他已控制變項：年齡分組以虛擬變項控制。

\* p<0.05; \*\* p<0.01; \*\*\* p<0.001

其次，對客家族群來說，整體而言它與閩南族群之間並不存在族群差異（表1以及表3的模型一、二）。但在控制國語流利程度之後，卻反而出現顯著的劣勢——對中職業地位之取得而言，客家人的勝算要比閩南人少了23%（模型三：OR=0.77），對高職業地位之取得而言，也出現類似的變化（OR=0.68）。換言之，客家與閩南族群之間，職業取得之所以不存在差異，是因為它平均來說有較佳的國語能力（分析結果未顯示）。一旦在相同教育程度與國語能力的情況之下，客家族群的職業取得反而略顯弱勢。

最後，我們回頭審視語言變項本身（模型三與四），發現國語能力對於一個人的職業取得，確實具有獨立於教育程度之外的顯著影響。國語流利程度每增加一個等級，取得中職業地位的勝算即增加41%；換句話說，倘使一個人的國語流利程度從「會一點」提升至「標準」，這項勝算將增加至將近三倍（ $(1.41)^3 = 2.80$ ）之多。相較之下，閩南語，至少針對此處的職業分類來說，並未呈現任何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此外，國語及閩南語能力對高職業地位的取得之影響，也顯示相同的結果。<sup>18</sup>至此的結論與蔡淑鈴先前的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多項式邏輯迴歸分析所採用的被解釋變項（職業三分類），將高薪、高自主性的「高層專業與主管階級」以及體力勞動程度較高的「農工階級」這兩種類別區分出來，最主要的意義在於它們具有明顯的社經地位高低之分，以及勞動性質的實質差異（勞心vs.勞力）。然而在這種三分類之下，被歸類為「中職業地位」之職業種類，則顯得範圍廣泛而繁雜。因此，我們同時也將職業分類轉化為黃毅志（2005）所發展

---

<sup>18</sup> 若將「國語程度變項」原勝算比轉化為x標準化後之勝算比，則分別為1.31（中vs.低）及1.70（高vs.低），亦即國語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取得中職業地位的勝算便增加31%，取得高職業地位的勝算則增加70%。

出來的職業社經地位五等級分類，另外嘗試等第邏輯迴歸分析（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並得到相當一致的結論（參見附錄表格）。這顯示了分析結果的穩定性。

## 2. 雇主身分

職業除了地位高低之外，從業身分也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尤其是「雇主身分」；且先不論企業組織的大小，我們想知道的是，誰才是「頭家」呢？分析資料中所包含的資訊，容許我們將「雇主」身分做進一步的區分，亦即，將雇用九位及以下領薪水員工的「小雇主」與雇用十位以上員工的「大雇主」區分開來。台灣的中小企業林立，小型公司的頭家，與中大型企業的老闆，所隱含的地位與意義不盡相同；這樣的區分，要比「雇主」單一類別，揭露更多的訊息。

針對閩南語程度對雇主身分<sup>19</sup>之影響，表4呈現了多項式邏輯迴歸的分析結果。首先，我們先將焦點放在「小型企業的雇主身分」。表4的上半部即試圖回答此問題：相較於其他自雇或受雇狀態，族群與語言能力會影響「成為小型公司老闆」的機會嗎？

模型一的結果，與先前表2所呈現的結果事實上是相同的；而模型二進一步考慮教育程度之後，仍顯示雇主身分的族群差異，亦即，在相同的教育程度之下，客家及外省兩族群當小老闆的機會，都比閩南族群顯著地來得低。以外省族群為例，外省男性成為小雇主的勝算，只有閩南男性的不到八成。接著，模型三與四先後將閩南語及國語流利程度納入分析，我們發現：（1）閩南語能力對成為小雇主的機會具有顯著的

---

<sup>19</sup> 表4被解釋變項「雇主身分」所參照的是「非雇主身分」，因此包含了受雇及自營兩種從業身分。此分析若排除自營身分，只將參照群體限定於受雇身分，也會得到相似的結果。

表4 族群及語言能力對「是否當老闆」之影響：多元邏輯迴歸分析<sup>a</sup>

(N=9,646)

解釋變項	依變項：是否當老闆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自己當老闆，雇員≤9人（相較於其他自雇或受雇狀態）				
族群（相對於閩南）				
客家	0.74** (-2.73)	0.73** (-2.92)	0.80 (-1.95)	0.80 (-1.95)
外省	0.78* (-2.21)	0.79* (-2.02)	0.87 (-1.15)	0.87 (-1.11)
閩南語流利程度（五等級） <sup>c</sup>			1.19*** (3.45)	1.19*** <sup>c</sup> (3.23)
國語流利程度（五等級）				1.00 (-0.02)
自己當老闆，雇員≥10人（相較於其他自雇或受雇狀態）				
族群（相對於閩南）				
客家	0.60** (-2.65)	0.58** (-2.83)	0.67* (-2.00)	0.58** (-2.72)
外省	1.00 (-0.03)	0.82 (-1.19)	0.98 (-0.14)	0.83 (-1.06)
閩南語流利程度（五等級）			1.34*** (3.49)	1.19* (2.00)
國語流利程度（五等級）				1.39*** (3.60)
其他控制變項 <sup>b</sup>				
教育程度（六類別）		∨	∨	∨
年齡（五組）		∨	∨	∨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18.9 (4)	119.3 (22)	143.7 (24)	157.2 (26)
Pseudo R <sup>2</sup>	0.002	0.009	0.012	0.014

<sup>a</sup> 本分析只限男性樣本，且不包括原住民；表中數字為多元邏輯迴歸所得之勝算比（=exp(β)）；括號內數據為z值。

<sup>b</sup> 教育程度及年齡以虛擬變項控制，符號∨指模型已納入此變項。

<sup>c</sup> 額外分析：關於「閩南語對小頭家之顯著效應」，在排除閩南族群之後重做分析，此閩南語效應對非閩南族群仍然顯著，且係數更大（勝算比=1.31）。

\* p<0.05; \*\* p<0.01; \*\*\* p<0.001



正影響（閩南語流利程度每增加一等級，勝算就增加了約19%），但國語能力則無。<sup>20</sup>（2）控制閩南語之後，外省及客家族群原本顯著較低的小雇主機會變得不再顯著，係數也發生明顯的變化（外省勝算比由0.79變為0.87，客家勝算比由0.73變為0.80）；換言之，閩南語能力解釋了閩南族群的小雇主優勢。（3）從仍然偏低的勝算比以及介於顯著邊緣的P值來看（若將顯著水準訂為0.10，那麼客家係數仍屬顯著），我們可以說，即便將語言能力考慮進去，客家族群相較來說可能仍然較不易成為小雇主。

表4的下半部呈現了另一個類別的結果：相較於其他自雇或受雇狀態，族群與語言能力會影響「成為中大型公司老闆」的機會嗎？<sup>21</sup> 首先，就族群差異來說，從族群勝算比的變化以及是否顯著來看，有沒有控制教育程度<sup>22</sup> 或語言能力，與成為中大老闆的族群差異，似乎並沒有太大的關聯。客家族群成為中大老闆的機會，不論有無控制其他自變項，始終顯著低於閩南族群。外省族群在這方面則與閩南族群沒有統計上的差異。其次，就語言效應來說，有趣的是，兩種優勢語言（作為官方正式語言的國語，以及作為主要通行語言之一的閩南語）都對「大雇

---

<sup>20</sup> 額外的分析顯示，當我們將分析範圍限定於「非閩南族群」樣本時，此閩南語能力對於「成為小頭家」的影響同樣十分顯著。

<sup>21</sup> 有鑑於既有文獻指出外省族群有較高的機會集中於公部門，此處我們做了額外分析：若排除「工作於公部門」，並不會影響上述分析結果。

<sup>22</sup> 既有文獻曾指出教育年數與當頭家機率為倒U型的非直線關係（熊瑞梅、黃毅志1992）。觀察控制變項「教育程度」的係數，我們發現分析結果與既有文獻相當一致：對小雇主此類別來說，在其他條件相當的情況下，學歷可以增加一個人晉升頭家的機會，但超過專科以上，則反而降低。對大雇主此類別來說，機率最大的類別則落在大學學歷。

主身分」具有顯著的影響力。<sup>23</sup>

### （三）以「工具變項估計法」來重新估計語言效應

如同文獻探討所提及，傳統分析方法在估計語言程度真正的影響力時，具有相當大的限制。「遺漏變項」、語言與職業之間的「同步因果關係」，以及自我評估而得之語言能力的「測量誤差」等問題都會造成語言效應的估計偏誤。因此，我們會懷疑，以上分析所得到的結論可靠嗎？語言能力與職業之間確實存在著顯著的相關，但此相關真的適合做因果關係的推論嗎？爲了排除上述各項可能的估計偏誤，在此，我們採用「工具變項估計法」重新對語言效應做更準確的估計，並將新的估計結果與傳統方法做比較。

進入分析之前，首先，爲了確定所選擇的工具變項是恰當的，我們先檢驗工具變項的相關性（instrument relevance），亦即，工具變項（「岳父族群爲外省」或「妻子國語流利程度」）是否顯著影響內生解釋變項（受訪樣本的國語流利程度）？類似地，「岳父族群爲閩南」與「妻子閩南語流利程度」是否顯著影響受訪樣本的閩南語流利程度？針對這一點，內生解釋變項與工具變項之間的相關強度，在納入控制變項之後的迴歸分析，F檢定中的F值至少必須要大於10（Stock et al. 2002）。在此，我們不論是單獨檢驗單一工具變項，或是同時納入兩個工具變項，F值都大於10，滿足工具變項相關性這項要件。

接著，表5呈現國語流利程度對職業地位高低的邊際影響，表6呈現閩南語流利程度對成爲雇主的邊際影響，兩個表同時呈現不同估計方法

---

<sup>23</sup> 從標準化係數來看，「閩南語流利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成爲大雇主的勝算便增爲1.14倍；而「國語流利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此勝算增爲1.29倍。

表5 國語流利程度對職業取得的邊際影響：傳統方法vs.工具變項估計法<sup>a</sup>

語言效應（國語）	Probit		OLS迴歸	
	職業地位 =高 <sup>b</sup>	職業地位 =高或中 <sup>c</sup>	職業地位 =高	職業地位 =高或中
模型一： 傳統估計方法	0.05 *** [0.26] <sup>d</sup> (0.03)	0.08 *** [0.23] (0.02)	0.04 *** (0.01)	0.07 *** (0.01)
模型二： IV = 岳父外省	0.31 *** [1.15] (0.27)	0.40 * [1.09] (0.31)	0.40 * (0.18)	0.33 + (0.19)
模型三： IV = 妻子國語程度	0.08 *** [0.43] (0.06)	0.14 *** [0.39] (0.05)	0.06 *** (0.01)	0.13 *** (0.01)
模型四： IV = 岳父外省 + 妻子國語程度	0.08 *** [0.42] (0.06)	0.14 *** [0.39] (0.05)	0.06 *** (0.01)	0.13 *** (0.01)
Overidentification test $\chi^2$			5.18 (p=0.02)	1.23 (p=0.27)
樣本數	9,057	9,057	9,057	9,057

<sup>a</sup> 限男性樣本，不包括原住民。其他已控制變項：教育程度、年齡、族群。

<sup>b</sup> 職業（高）= 高層專業、經理、主管（相較於中或低：指一般專業、半專業、服務業及農工階級）

<sup>c</sup> 職業（高或中）= 高層專業、經理、主管、一般專業、半專業、服務業（相較於低：指農工階級）

<sup>d</sup> [ ]內數據為probit模型之原始係數，( )內數據為標準誤。

\* p<0.05; \*\* p<0.01; \*\*\* p<0.001

（傳統估計方法以及採用工具變項的三個模型）所得的估計值，以供比較。這兩個表結構相似：左半部是採用probit模型的分析結果，右半部則是OLS迴歸分析結果。當被解釋變項為二元變項<sup>24</sup>時，原本應採用較為適當的probit模型，此處同時呈現OLS迴歸分析結果是為了針對模型四

<sup>24</sup> 由於多元變項並不適用於工具變項分析法，我們將職業地位與雇主身分這兩個被解釋變項重新編碼為二元變項。社會學領域較為常用的邏輯迴歸亦不適用於工具變項分析法，因此改採用probit模型來估計。

做「過度認定測試」(overidentification test)。<sup>25</sup>

從表5的分析結果，我們發現，不論採用「岳父外省」或「妻子國語程度」，或同時採用這兩個變項作為工具變項，都得到了顯著的語言效應；且工具變項估計值，都要比用傳統方法得到的估計值來得大。這與國外既有文獻的發現一致(Dustmann and van Soest 2002; Bleakley and Chin 2004)。以同時採用兩個工具變項的probit模型四來說，分析結果顯示，國語流利程度每增加一級，取得高職業地位（相較於中或低職業地位）的機率便增加8個百分點；但是，以傳統估計方法（模型一）所得的估計值則只有5個百分點。倘若我們改變職業的二元編碼，結果亦十分類似（見表5的第二欄）：國語流利程度每增加一級，取得中或高職業地位的機率（相較於農工階級）便增加14個百分點（模型四），但是，以傳統估計方法所得的估計值則只有8個百分點（模型一）。

為了針對模型四做「過度認定測試」，表格的右半部同時呈現了OLS迴歸分析結果。<sup>26</sup> 首先，針對「取得高職業地位」（表5第三欄模型四），我們並未通過過度認定測試（p值為0.02），<sup>27</sup> 這顯示，這兩個工具變項至少有一個是不恰當的（當然也有可能兩個都不恰當）。在此處，以「岳父外省」作為工具變項所得之估計值要遠大於以「妻子語言」作為工具變項所得之估計值，兩者不一致的結果導致較大的 $\chi^2$ 值以及小的P值。以常理來說，相較於「妻子語言」，「岳父外省」對於樣

---

<sup>25</sup> 模型四同時採納了兩個工具變項（工具變項個數大於內生解釋變項的個數），使得我們得以應用「過度認定測試」來確認兩種工具變項不會得到相互矛盾的分析結果。在此測試中，顯著的結果表示以兩種工具變項來估計，會產生不一致的結果。

<sup>26</sup> OLS迴歸所呈現的邊際影響，亦即迴歸係數，與probit分析結果差異並不大。

<sup>27</sup> 若將顯著水準訂為0.05，則無法通過過度認定測試；若將之訂為0.01，則算通過測試。

本本身職業取得的影響應該更為間接，以岳父族群來作為工具變項應更為恰當。接著，針對「取得高或中職業地位」（表5第四欄模型四），過度認定測試（p值為0.27，沒有顯著）則顯示：以「岳父外省」作為工具變項所得之估計值與以「妻子國語程度」作為工具變項所得之估計值，兩者並未提供相互矛盾的結果，增加結論的可靠性。

表6以類似的分析方法及表格結構呈現閩南語程度對於成為雇主<sup>28</sup>的邊際影響，並得到與表5十分相似的結果：首先，不論採用「岳父閩

**表6 閩南語流利程度對成為雇主的邊際影響：傳統方法vs. 工具變項估計法<sup>a</sup>**

語言效應（閩南語）	依變項：雇主身分	
	Probit	OLS迴歸
模型一：傳統估計方法	0.02 *** [0.10] <sup>b</sup> (0.02)	0.02*** (0.01)
模型二：IV = 岳父閩南	0.10 [0.42] (0.50)	0.08 (0.13)
模型三：IV = 妻子閩南語程度	0.05*** [0.23] (0.06)	0.05*** (0.01)
模型四：IV = 岳父閩南 + 妻子閩南語程度	0.05*** [0.22] (0.06)	0.05*** (0.01)
Overidentification test $\chi^2$		0.05 (p = 0.81)
樣本數	9,316	9,316

<sup>a</sup> 限男性樣本，不包括原住民。其他已控制變項：教育程度、年齡、族群。

<sup>b</sup> [ ]內數據為probit模型之原始係數，( )內數據為標準誤。

\* p<0.05; \*\* p<0.01; \*\*\* p<0.001

<sup>28</sup> 由於工具變項估計法無法處理多類別的被解釋變項，因此不同於表4，此處的被解釋變項並未區分雇員人數多寡，單純為「雇主身分」之二元變項。

南」或「妻子閩南語程度」，或同時採用這兩個變項作為工具變項，都得到了顯著的語言效應；且工具變項估計值，都要比用傳統方法得到的估計值來得大。以同時採用兩個工具變項的probit模型四來說，分析結果顯示，閩南語流利程度每增加一級，成為雇主的機率便增加5個百分點；但是，以傳統估計方法所得的估計值則只有2個百分點。接著，表格右半部的OLS迴歸結果，一方面與probit分析結果十分相似；另一方面，模型四的過度認定測試（p值為0.81，沒有顯著）則顯示：以「岳父閩南」作為工具變項所得之估計值與以「妻子閩南語程度」作為工具變項所得之估計值，兩者並未提供相互矛盾的結果，增加結論的可靠性。

## 五、結論與討論

影響一個人的職業取得之因素，相當多元複雜；從個體層面提升至總體層面，「哪些因素影響了職業的族群差異？」，也不是個單純、容易回答的問題，絕不可能是單一或少數幾個因素所能完整解釋。本分析的主要提問，乃在於探討語言資本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是否能夠解釋部分的職業族群差異。

### （一）語言能力確實是一種「資本」

首先，本文的分析結論，大致上支持「語言能力具有正向效果，幫助一個人取得較佳社會位置」這樣的論點；然而，正因為台灣的社會歷史脈絡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特性，讓我們得以針對原論點稍作修正。

蔡淑鈴（2001）延展Bourdieu的「語言資本」概念，以實證分析顯示，一個人是否精通該社會的官方正式語言，與其社經地位高低有顯著

的相關性；並提出「國語能力是一種正向資本，有助於職業地位的取得」以及「語言使用與勞動市場之高低位階有關」等等論點。不過，由於資料與分析方法的限制，這份研究所提供的結論，嚴格來說只能說是一種相關的呈現；亦即，觀察樣本受訪當時的職業社經地位高低與國語能力之間的相關程度。

若將職業與語言能力之間的這項相關，當作我們所估計出來的語言效應，那麼，有兩種可能性會讓我們高估了語言程度的實際影響力：第一種可能是，有些人很可能本身能力就比較好，有較佳的語言學習能力，而內在的能力同時會影響他的職業取得，此乃遺漏變項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第二種可能是，受訪者進入某個職業領域，而該職業的環境或需求，使他在某種語言上有更多的練習機會，換言之，語言能力可能影響職業取得，但職業也可能回過頭來影響語言能力，此乃同步因果關係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多數探討語言對於薪資所得之影響的既有文獻，所採用的資料都是一般調查資料，其中和語言能力有關的資訊都來自於受訪者自我評估而得的語言程度，只有簡單幾項等級的區分，而使用這類資料，會造成語言效應的低估（有關測量誤差的詳細探討，參見Bleakley and Chin 2004）。換句話說，在評估語言程度的影響力時，如何找到沒有偏誤的估計值？傳統分析方法所提供的結論究竟是否可靠？這成爲一個實證上的問題。

總體來說，本文所提供的貢獻，一方面是從改善分析方法出發，肯定了蔡淑鈴的論點；另一方面則是從提問方向出發，補充其論點的不足。

分析方法上來說，工具變項分析法乃針對傳統分析方法的種種限制，利用「會影響一個人的語言能力，但不會直接影響其職業取得」的變項作爲「工具」（岳父族群以及妻子語言程度），試圖將有系統性估



計偏誤的部分以及無系統性估計偏誤的部分區分開來，藉此得到沒有偏誤的語言效應估計值。而我們發現，從工具變項分析法所得到的估計值來看，語言能力對於職業取得的實際影響力，要比傳統分析方式所得之估計值來得大，而這項結論與國外文獻的發現一致（Dustmann and van Soest 2002; Bleakley and Chin 2004）。更具體地說，蔡淑鈴所提出的論點「國語能力是一種正向資本，有助於職業地位的取得」，在此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

就提問方向而言，本文進一步探究其他語言所扮演的角色，並未將分析範圍侷限在既有文獻較為關切的國語能力。台灣的社會歷史脈絡具有其獨特性，閩南語雖不屬於官方正式語言，且在正式領域中曾被貶抑，但由於閩南族群之人口多數，使得閩南語在非正式領域（如家庭、邊陲的勞動市場）中，始終是一個重要的主要通行語言。本文的另一項重要結論，即在於指出，不僅僅作為官方語言的國語具有語言資本的正向影響，同時也發現，作為主要通行語言之一的閩南語，在特定脈絡之下，對於職業取得的某些面向也具有正向的功能。

更具體地說，閩南語能力對於小雇主身分具有正向影響，這項結論，在排除閩南族群之後重作分析，也一樣成立；此外，工具變項分析法所提供的估計值，也得到與國語能力部分類似的結果：以更為可靠的工具變項分析法所估計而得的語言效應，要比以傳統方法所得的結論來得更大。換言之，使用閩南語之場域，雖經常與非正式部門高度相關（亦即蔡淑鈴所謂的「不好的勞動市場」），但閩南語作為一種多數族群的溝通工具，具有轉化為社會資本的潛能，在較邊陲的私部門當中，某種程度上仍扮演了語言資本的角色。想像一個不滿意自己受雇狀態的非閩南人，在重視人際關係的小型企業組織網絡中，試圖集資創業，此時，是否掌握閩南語能力（以及隨著語言能力而來的文化融入程度）確



實可能成爲相當關鍵的因素。

要脫離自雇或受雇身分，成爲小頭家，閩南語能力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國語能力則未扮演任何角色；相較之下，對於成爲中大型事業主來說，兩種語言（國語、閩南語）同時都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形成有趣的對比。換句話說，如果單純只看職業地位高低（如既有文獻或本文前半部分分析），或許檢驗不出閩南語資本的影響力；然而，一旦考慮到亟需人脈的「大雇主」此一從業身分，可以看得出來，不論是官方正式語言的國語，或是使用人數多數的閩南語，兩種語言能力都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都成爲累積社會資本的利器。

## （二）語言資本與職業的族群差異

其次，本文另一項分析結論在於，語言效應雖無法完全解釋職業的族群差異，但確實能夠解釋部分的族群差異。

在職業地位的族群差異上，相較於低技術、勞力密集、地位較低的職業類別，外省族群成爲高層專業、管理階級（或是取得一般中間地位的職業）的機會，顯著地高於閩、客兩族群，即便是在相同教育程度的情況下仍是如此。至於閩、客之間，整體而言，這兩個族群在各類職業地位（高、中、低）的分布幾乎相同，但在相同教育程度的情況下，客家族群的職業地位稍微偏低（不過此差異在統計上未達顯著水準）。<sup>29</sup>

上述外省與閩南兩族群之間的職業地位差異，在控制國語能力之後，族群效應被解釋了大部分；相較之下，閩南語能力在此處則不具顯

---

<sup>29</sup> 既有文獻指出客家族群的平均教育程度比閩南族群稍高（黃毅志、張維安 2000）。此處，資料分析與既有文獻的結論一致，這也解釋了爲何兩族群之間，整體職業地位沒有差異，但控制教育程度之後，客家反而略顯弱勢。

著影響，亦無解釋能力。這也就是說，一旦具有相同的國語程度，閩南族群取得高地位職業的機會與外省族群是沒有差異的。至於中職業地位這個類別，即便進一步控制了國語能力，外省族群仍有顯著較高的勝算；在這裡，另一種語言能力（英語）很可能提供部分的解釋。<sup>30</sup>

至於閩、客之間的職業地位比較，雖然整體而言並沒有明顯的差異。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一旦考慮國語能力這個因素，客家族群卻出現負影響。也就是說，在教育程度及國語能力相當的情況之下，客家在高（或中）職業地位的取得上，要比閩南、外省兩族群來得弱勢。或者，再換句話說，比較客家與閩南族群之間的職業取得，整體來說之所以不存在差異，是因為客家人平均來說有較佳的國語能力<sup>31</sup> 以及偏高的教育程度。

事實上，既有文獻（蔡淑鈴 2001）與本文資料分析都顯示，閩南人的國語能力明顯地低於其他族群。這項差異並不難理解。早期，對既非政經優勢，亦不占人數優勢的客家族群來說，有相當大的動機去熟習官方正式語言；但閩南族群卻因身為多數族群，閩南語的存續及通行上享有較多的優勢，因此「精進官方正式語言」這件事對閩南人口並非要務。這使其平均國語能力遠低於其他族群。相較之下，身為人數少數的客家族群，要比人數多數的閩南族群，更需要教育程度以及語言能力作為一種人力資本，來提升自己的職場競爭優勢。

---

<sup>30</sup> 資料分析顯示，外省族群的英語能力要比其他三族群都來得高；原因很可能在於既有文獻已指出的「外省族群就讀文科或從事文職的比例偏高」（蘇國賢、喻維欣 2007）。或許促使外省族群選擇文科的原始因素在於國語能力，然而一旦進入文組（包括文、法、商管等領域），很可能有較大的機會去選擇對英語能力需求較大的相關科系或職業（如公關、傳播媒體、文化出版等）。

<sup>31</sup> 資料分析結果未呈現。

在職業地位之外，當我們將焦點放在從業身分當中的雇主身分時，卻發現了另一種面向的族群差異：閩南人有偏高的比例屬於（雇員不超過九人的）「小頭家」身分。然而，在控制閩南語流利程度之後，外省族群的負效應隨即消失，客家族群的負效應亦降至顯著邊緣；但納入國語能力則不影響分析結果，國語本身亦不具影響力。此外，即使將分析範圍限定為外省、客家兩族群，所估計出來的閩南語效應，仍然相當顯著。也就是說，閩南語能力與閩南族群之小頭家優勢高度相關；外省、客家族群一旦掌握了閩南語能力，要脫離自營或受雇身分而成為小頭家，其機會是差不多。除此之外，在這個場域當中，國語流利與否並不具任何影響力。這項結論所隱含的意義在於，族群並非重點，語言文化很可能更為關鍵。

過去文獻顯示，整體而言雇主的比例並無族群差異（蘇國賢、喻維欣 2007）；但此結果是由於沒有區分雇員規模所致。當我們將雇員為個位數的小型事業主抽出來看時，便發現了族群差異。本分析之結果——閩南人的小頭家比例較高，確實也符合了「閩南人自營比例較高」（蘇國賢、喻維欣 2007）以及「自營狀態增加了『成為小頭家』的可能性」（Yu and Su 2004）這兩項既有文獻結論的綜合推論。

當閩南語資本為「小雇主的族群差異」提供大部分的解釋時，語言資本似乎並不影響「大雇主身分」的族群差異。客家族群成為大老闆的機會，不論有無控制其他自變項，始終顯著低於閩南族群。外省族群在這方面則與閩南族群沒有統計上的差異。換言之，客家人成為中大型事業主的可能性遠小於閩南及外省族群。

### （三）與既有文獻的連結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及資料分析結果，我們所得到的結論，不僅支持作為官方語言的國語具有語言資本的正向影響，同時也發現，作為主要通行語言的閩南語，在特定脈絡之下，對於職業取得的某些面向也具有正向的功能。

在相同教育程度之下，國語能力會影響「職業地位高低」。國語之外，閩南語能力雖然對職業地位高低不具影響力，但閩南語流利程度卻提高「成為小雇主」之機會，即使將分析範圍限定為外省、客家兩族群，所估計出來的閩南語正效應，仍然相當顯著，排除了「語言與族群高度相關」此一事實所可能造成的分析結果偏誤。

根據工作場域主要使用語言及職業地位之間的相關，蔡淑鈴（2001）指出正式官方語言與非官方語言之間具有上下高低的位階關係，且經常與階級相符應，並依此論證「語言使用是權力關係的展現，因此語言資本的獲得與分配，本身就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階層面向」。但蘇國賢、喻維欣（2007）卻認為「語言資本在台灣既沒有形成技能的區隔，也沒有被當成階級篩選的訊號」（蘇國賢、喻維欣 2007: 13），並以實證資料顯示，原本擁有的語言文化優勢，長期運行下來，整體來看可能反而成為外省族群社會流動的限制。

本文的研究結論，能為這兩者之間不一致的看法，提供整合的可能性嗎？這些結論，又為我們在族群及職業取得這個主題上增進了哪些瞭解？

基本上，針對語言資本之重要性，本文的分析結果與蔡淑鈴的論點，可說是一致的；亦即，兩者的實證發現都肯定了語言能力之於職業取得之重要性。但本文不同的是，在國語這個官方正式語言之外，我們

的分析證實了使用人數占多數的閩南語，在某些社會脈絡之下，也可以發揮它的作用。換言之，語言確實經常是一種技能，問題只在於不同的語言，往往是在不同的社會脈絡與條件之下，各自發揮其影響力。

過去的觀點，不將閩南語視為一種具有正向功能的技能，主要理由在於，在獨特歷史脈絡及政治威權之下，這個語言曾經受到貶抑，在語言文化之間的折衝過程中，陷入所謂的低位階。不過此觀點忽略的是，閩南族群畢竟是一個占人數優勢的族群，其語言的存續與通行，與多數情況少數族群所面臨之文化存續問題的嚴重程度稍有不同。當一個人具有所處社會脈絡、工作場域的主要通行語言之能力（即便平均來看此場域屬於較為弱勢、邊陲的部門），便能夠藉著有效率的溝通，或是透過展現文化親近性、強化信任關係與社會連帶等等方式，將語言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及經濟資本；換句話說，此時，這項語言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具有「技能」、「人力資本」的特質。

另一方面，此處的研究結論與蘇喻兩人所提出來的故事，事實上也能夠互相呼應。社會的發展演變並非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因此，語言文化即便具有位階關係，也可能會在變遷過程中緩慢改變其關係性質。透過一個動態的變遷歷程，個人決策及其決策後果的長期累積，形塑了社會變遷的樣貌。更淺白地說，外省族群或許能夠因國語能力而在職業取得上取得某些優勢（如職業地位偏高），但是當論及另一種「黑手變頭家」形式的向上流動，卻是弱勢的。語言或許不是此弱勢的唯一解釋，但語言的限制應屬相當關鍵的原因——較弱的閩南語能力，使其在以閩南語為主的勞動力市場中不易累積社會資本，成為小雇主的機會較低。

除此之外，這個長期變遷的過程也充分展現了得失一體這個概念。閩南族群因其人數多數，平均而言，對於國語能力的掌握要比其他任何

族群都來得更慢與更弱；然而，這一層弱勢，卻因人數多數而使得閩南語對國語的抗拒較強，並以「重要通行語言之一」的身分展現其類似人力資本的正向功能。類似地，國語能力較差者，更可能進入所謂的較差的勞動力市場；但是這層弱勢，卻讓人更有動機去追求高風險、高利潤的頭家身分，其中一小部分的成功者，便得以展現幅度較大的社會流動。此時，語言文化之間原本明顯、清晰的高低位階關係，長期來說，便可能經歷一個模糊化、平等化的過程。

#### （四）語言資本的意涵

最後，我們要回到一個並不容易釐清的、更深入的層面來討論本文所辨識出來的「語言效應」。所謂的「語言資本」這個概念真正的意涵是什麼？是經濟學家口中的「人力資本」？還是，回到社會學家較偏愛的切入點，擁有語言資本乃代表一種「文化或政治優勢」呢？

經濟學式的理解，較強調語言作為一種「技能」的意義；流利的語言能夠增加溝通效率，提高生產力，因此具有人力資本的特質。相較之下，Bourdieu所強調的語言資本概念，更加著重語言（以及與其相應之文化）所展現的象徵意義，附帶著政治權力的意涵。就如同蔡淑鈴藉由「發現國語程度對職業地位有正向影響，但閩南語能力卻全無影響力」，來論證「並非所有的語言能力都可以兌換到同等值的語言資本」；這樣的詮釋，便是「語言作為一種文化及（或）政治優勢」的最佳例證。

那麼，本文進一步的發現又具有什麼樣的意涵？為什麼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職業面向上展現了如此不同的影響力呢？

先以成為小雇主為例。亟欲脫離受雇階級（尤其是平均待遇較差的

中小企業私部門)的熱切期望、掌握創業機會這樣的向上流動的機制，很可能並非平均地分布於社會各角落，而較集中在某些行、職業的社會脈絡中(很可能是蔡淑鈴所謂的「壞」的勞動力市場)。此時，閩南語能力要比國語來得更具影響力。當某種語言為特定社會脈絡、特定群體當中的主要通行語言時，我們很難否定該語言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具有人力資本的特質(如果連表達與溝通都無法順暢，要從何協調工作、累積人脈、管理人資?)。但另一方面，要說這項語言效應乃是透過語言而展現的文化親近性在發揮作用——譬如強化人際關係的信任，也是一種十分合理的詮釋。這兩種解釋機制何者較為關鍵?這並不是一個容易釐清的問題，甚至很可能相互交纏、同時運作著。

類似的邏輯也可以用來詮釋另一項結果。既有研究及本文分析結果都一致地發現，當國語能力對職業社經地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時，閩南語幾乎毫無影響力。由於國語是所謂的較「好」的勞動力市場當中的主要通行語言，因此國語能力成爲一種人力資本(譬如，國語文能力若不足，可能連基本文書工作都有困難)；但另一方面，我們實在也很難排除這樣的可能性：除了人力資本之外，這項語言能力的展現同時也附帶著其他意義，亦即，較佳的國語能力隱含著「有文化、有受教育、社經地位可能較高」的形象(即便其實教育程度並不高)，因此有助於社經地位的晉升。換句話說，這項語言效應的運作也很可能是由於長期累積的、帶有高下優劣的「文化評斷」所致。

這兩種情形都說明了語言資本這個概念的模糊性與複雜性，以本文有限的實證分析，並無法清楚地指出語言效應背後真正的原因與機制。此外，以上所討論的兩種語言效應，其影響機制雖然可能具有某些共通性，但這兩者仍存在著重要的差異；那就是，國語何以成爲高社經職業場域、社會脈絡的主要通行語言，並非自然形成，而是當時的執政者透



過高壓政治手段來強制實行單元文化國語政策的結果。這個歷史因素，正是上述的國語文化優勢論，也經常被理解成政治優勢的主因。

### 作者簡介

陳婉琪，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教育、家庭、勞動、性別。目前主要研究重點為離婚的教育差異變遷趨勢、父母教養對青少年的影響、教育的性別隔離。

溫郁文，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目前為國科會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附錄 族群及語言能力對職業取得之影響：等第邏輯迴歸分析<sup>a</sup>

(N=9,368)

解釋變項 <sup>c</sup>	依變項：職業社經地位（五等級） <sup>b</sup>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族群（相對於閩南）				
客家	1.04 (0.59)	0.96 (-0.66)	0.85** (-2.63)	0.85* (-2.41)
外省	2.26*** (13.32)	1.19* (2.55)	1.04 (0.63)	1.05 (0.70)
教育程度		2.34*** (51.53)	2.23*** (47.02)	2.23*** (46.81)
國語流利程度			1.39*** (11.28)	1.39*** (10.46)
閩南語流利程度				1.01 (0.32)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180.1 (2)	3546.6 (7)	3674.7 (8)	3674.8 (9)
Pseudo R <sup>2</sup>	0.007	0.143	0.148	0.148

<sup>a</sup> 本分析只限男性樣本，且不包括原住民；表中數字為等第邏輯迴歸所得之勝算比（=exp(β)）；括號內數據為z值。

<sup>b</sup> 職業按平均社經地位分為五等級（黃毅志2005）：5 = 專業、主管人員；4 = 半專業人員；3 = 事務工作人員；2 = 服務買賣人員、技術工；1 =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非技術工。

<sup>c</sup> 教育程度分別以連續變項（六等級）或虛擬變項來控制，都得到十分相似的結果，故此處以較簡潔的形式來呈現結果；各項語言流利程度皆為五等級；其他已控制變項：年齡分組以虛擬變項控制。

\* p<0.05; \*\* p<0.01; \*\*\* p<0.001

## 參考書目

- 于若蓉，2004，〈私人受雇者轉換自營作業工作決策——「不景氣—推擠」效果假說〉。《經濟論文叢刊》32(1): 63-96。
- 王甫昌，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2: 1-45。
- 吳乃德，1997，〈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1: 137-167。
- 林忠正、林鶴玲，1993，〈臺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頁101-160，收錄於張茂桂等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洪惟仁，1995，〈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頁119-158，收錄於許俊雅編，《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台北：國立師範大學。
-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學》10: 1-40。
- 黃毅志，2001，〈台灣地區多元勞力市場的事業成就之比較分析〉。《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彙刊》11(4): 356-370。
- 黃毅志，2005，〈教育研究中的「職業調查封閉式問卷」之信效度分析〉。《師大教育研究集刊》51(4): 43-71。
- 黃毅志、張維安，2000，〈台灣閩南與客家族群社會階層背景之分析〉。頁305-338，收錄於台灣省文獻會編，《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 葉錫南、詹惠珍、程玉秀，2004，〈台灣地區的語言使用：語言能力與場域分析〉。《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49(1): 75-108。（in

English: Language Use in Taiwa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Domain Analysis)

熊瑞梅、黃毅志，1992，〈社會資源與小資本階級〉。《中國社會學刊》16: 107-138。

蔡淑鈴，1988，〈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客、及外省之比較〉。頁1-44，收於楊國樞與瞿海源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二十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蔡淑鈴，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台灣社會學》1: 65-111。

駱明慶，2001，〈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29(2): 117-152。

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和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 113-147。

駱明慶，2006，〈教育成就的性別差異與國際通婚〉。《經濟論文叢刊》34(1): 79-115。

蘇國賢、喻維欣，2007，〈台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省 / 外省族群差異的縮減〉。《臺灣社會學刊》39: 1-63。

Becker, Gary S., 196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Bourdieu, Pierre, 1977,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p.487-511 in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edited by Jerome

Karabel and A. H. Hals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leakley, Hoyt and Aimee Chin, 2004, "Language Skills and Earnings: Evidence from Childhood Immigra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6(2): 481-96.

Bleakley, Hoyt and Aimee Chin, 2008, "What Holds Back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anguage Human Capital among Immigrant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3(2): 267-98.

Chiswick, Barry R. and Paul W. Miller, 1995, "The Endogeneity Between Language and Earnings: International Analys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3: 246-88.

Chiswick, Barry R. and Paul W. Miller, 2001, "A Model of Destination-Language Acquisition: Application to Male Immigrant in Canada." *Demography* 38(3): 391-409.

Chiswick, Barry, Yew Lee and Paul Miller, 2005, "Parents and Children Talk: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Within Immigrant Families." *Review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3(3): 243-68.

Dustmann, Christian, 1994, "Speaking Fluency, Writing Fluency and Earnings of Migrant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7(2):133-156.

Dustmann, Christian and Arthur van Soest, 2001, "Language Fluency and Earnings: Estimation with Misclassified Language Indicato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3(4): 663-74.

Dustmann, Christian and Arthur van Soest, 2002, "Language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5(3): 473-492.

- Jæger, Mads Meier, 2009, "Equal Access but Unequal Outcomes: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Choice in a Meritocratic Society." *Social Forces* 87(4): 1943-1971.
- Gross, Joan E., 1993, "The Politics of Unofficial Language Use: Walloon in Belgium, Tamazight in Morocco."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13(2): 177-208.
- Lin, Nan, 1999,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467-487.
- McManus, Walter, William Gould and Finis Welch, 1983, "Earnings of Hispanic Men: the Role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2): 101-130.
- Rooth, Dan-Olof and Jan Ekberg, 2006, "Occupational Mobility for Immigrants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4(2): 57-77.
- Sagan, D., 1958, "The Estima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conometrica* 26(3): 393-415.
- Sandel, Todd L., Wen-Yu Chao and Chung-Hui Liang, 2006, "Language Shift and Language Accommodation across Family Generations in Taiw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7(2): 126-147.
- Schultz, Theodore W., 1963,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ields, Michael and Stephen Wheatley Price, 2002, "The English Language Fluency and Occupational Success of Ethnic Minority Immigrant Men Living in English Metropolitan Area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5(1): 137-160.
- Smits, Jeroen and Ayse Gunduz-Hosgor, 2003, "Linguistic Capital: Language

as a Socio-Economic Resource Among Kurdish and Arabic Women in Turke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6(5): 829-853.

Stock, James H., Jonathan H. Wright and Motohiro Yogo, 2002, “A Survey of Weak Instruments and Weak Identification in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20: 518-529.

Wang, Hong-Zen, 2001, “Ethnicize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Mobility Patterns among Owners of Small- and Medium-Scale Businesses.” *Modern China* 27(3): 328-358.

Winship, Christopher and Stephen L. Morgan, 1999, “The Estimation of Causal Effect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659-707.

Yu, Wei-hsin and Kuo-hsien Su, 2004, “On One’s Own: Self-Employment Activity in Taiwan.” in *The Reemergence of Self-Employment Activ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Employment Dynamics and Social Inequality*, edited by Richard Arum and Walter Mul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